

Winter 2013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December No.23

2013年12月 第二十三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23 期
2013 年 12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3842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编委会顾问

王恩哥 北京大学校长
陈吉宁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黄泰岩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金德水 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l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Artbazar Galtbayar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强一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Chimed Ganzori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2013年11月1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的北京论坛第十届年会——北京论坛（2013）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



P.14

→ 2013年10月18日至19日，“中国文化与亚洲的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

特稿

- 02 北京论坛（2013）召开
- 10 图们江论坛 2013 召开
- 12 “国际儒学论坛 2013” 召开

学术活动

- 13 “中韩教育交流的现状与未来” 研讨会暨李岚清著作赠书仪式在首尔举行
- 14 “中国文化与亚洲的价值” 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 16 “东亚文化交流的过去·现在·未来” 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 18 “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 学术研讨会举行
- 19 “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文化传统” 系列学术讲座连续举办 6 场

研究进展

- 21 印度私营企业国际化对中国的启示
- 32 论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中的中国形象

北京论坛（2013）召开



2013年11月1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的北京论坛第十届年会——北京论坛（2013）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苟仲文，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

璐，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伊克巴勒·里扎，澳大利亚前总理、国会议员陆克文，新加坡前外交部长



韩启德



郝平



苟仲文



朱善璐



王恩哥



约瑟夫·里德

杨荣文，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校长马尔科姆·格兰特，韩国 SK 集团副董事长金在烈和夫人梁寿子，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等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朱善璐主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向大会发来视频致辞，祝贺北京论坛成功举行。

2013 年是北京论坛创办十周年。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和学术研究热点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关于“文明和谐”的探讨却始终始终是论坛关注的焦点。本次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回顾与展望”为主题，力求在回顾中总结历史启示，在展望中探寻未来前景。

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在致辞中谈到，中国主张加强人文交流，这是对自身发展水平的清醒判断。今天的中国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经济发展和进步，但仍然要积极借鉴国外优秀文化，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各国和不同文明学习。希望北京论坛通过全方位多层面的探讨，剖析当前变革的世界新格局，抓住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新机遇，迎接旧的制度和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加强交流、增进共识的新思维，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家教育部郝平副部长在致辞中指出，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培育人文修养、传承人文精神和人民力量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发展，习近平主席在致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周年庆祝活动视频中



指出，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推动人类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在致辞中说，北京论坛创办十年以来，始终倡导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理念，推动跨文化沟通与对话，促进了海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一张闪亮的学术名片，北京论坛也显著提升了北京城市文化的品位，为北京的城市文化建设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北京已经有几千年的建城史，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北京的发展也已进入了全面

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把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朴仁国事务总长在致辞中谈到，去年是中韩建交二十周年，两国今年年初都选举了新的领导人，现都在充满热情地推动进一步的合作来应对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挑战。尽管在我们这个地区时常会出现紧张状态，但是中韩关系却始终是一个亮点，指引着地区合作的发展方向。北京论坛的成果日益丰硕，也彰显着东北亚地区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不仅在经济上非常重要，在学术领域也同样重要。他希望北京论坛能够成为业界的典范，汇集智慧、创造价值、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

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在致辞中指出，随着



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



陆克文



马尔科姆·格兰特



朴仁国



马凯硕



刘伟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学者的全球流动日益频繁，知识的创造、学术的关怀，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人类的福祉、地球家园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北京论坛的十年历程让我们看到，对话、沟通与理解正在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导，学者们在知识中追求更加广泛的认识与包容，展现出了令人尊敬的良知与远见。身处这样的大转型时代，我们既感到身上的责任，也感到无比幸运，在北京论坛这一平台上我们能够与来自全球的优秀学者相遇，为谋求全人类的福祉与发展贡献自己的思考。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北京论坛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一主题的提出及时而重要。当今世界的权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然而机会的

分配却并不均等。北京论坛将全球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城市化、环境保护及当代的其他挑战，从而协助我们增进理解，为正义事业而团结起来，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未来。他感谢各位拥护人道主义，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共担责任的未来，以及营造一个人类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开幕式后，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作特邀报告，他首先感谢北京大学和北京论坛的组织者创造这个平台，让联合国的成员国、学术界、媒体以及其他的各个组织成员都能够在此进行对话。纳赛尔指出，大会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而跨文化对



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的国际事务，实现和谐与稳定，进而带来繁荣。要消除和谐社会的潜在危害，就必须创造一个尊重人权的环境，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促进我们相互的理解和宽容，让社会走向和谐，走向繁荣。纳赛尔表示，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传统、文化遗产、思想资源和人文精神，在促进宗教、人权以及文化多样性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也必将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北京论坛和联合国文明联盟有着同样的愿景，即实现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文明联盟希望通过鼓励不同信仰、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北京论坛一道，推动这一愿景的实现，同时也希望通过北京论坛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鼓励中国的企业能够加入联合国文明联盟，一起实现区

域内的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伦敦大学学院校长马尔科姆·格兰特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发表了主旨演讲。

马凯硕在主旨报告中强调，北京论坛的重要性来自于当下人类正在经历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人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寻找再平衡，而这种再平衡应当是和平的进程。随后，马凯硕从再平衡出现的原因、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三个方面对当今世界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局面的原因在于“现代科学和科技”、“理智和逻辑的广泛传播”和“自由市场经济”三个规则群汇合成一个合力。这几个要素相互作用，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他承认，当今世界上有文明冲突、权力滥用、

地缘政治摩擦等问题，“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但人类的共同目标是实现文明的和谐，所以要共同决定，互相学习、尊重，平等对话，才能实现世界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马尔科姆·格兰特先生的大会主旨报告围绕当前全球中产阶级的迅速增长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应对展开。他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顶尖大学已经开始觉醒，在教育领域出现了诸多变化。首先是世界范围内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加，这不仅是世界人口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教育民主化的结果。与此相适应的，世界各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投资也在大幅增长。然而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机构也都受到巨大的经济冲击，学生人数的增长与资金捉襟见肘的矛盾最终引起学费的提高、奖学金的缩减与欧洲收费教育的普遍开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上升与国内教育资源的有限之间的矛盾引起留学势头的持续强劲，在这一背景下，各个国家也在积极进行教育改革，提升本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格兰特先生在谈到大学间的竞争与大学的经济效益问题时指出，大学作为科技前沿阵地对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也愈发重视本国大学排名，并由此加强了对大学的重视与投资，世界顶尖大学与本国各个大学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他对当前世界的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大学领导应主动打破学科界限，以跨学科交流合作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第二，全球顶尖大学之间应当积极合作，资源共享，以此促进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而这也是时代对教育机构提出的挑战。

刘伟发表了题为《中国实现发展的根本在于创新、在于改变发展方式》的主旨演讲。在

演讲中，刘伟探讨了中国经济30年来的发展水平与当下机会、发展条件变化、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促进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条件等四个问题。刘伟说，从GDP总量来看，中国经济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从人均GDP来看，中国的人均GDP30年来保持了年均8.7%的增长，已经步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何利用历史机遇，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到上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大体赶上当代一般的发达国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会。刘伟认为，30年后的今天，供给和需求这两个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要求一个国家无论是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还是企业的微观管理方式，必须作出根本性的变化，从善于应对短缺经济到善于应对过剩的经济。刘伟说，当前中国经济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风险。破解这一难题，需要经济结构的升级，结构升级一定要靠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包括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投资与消费的结构等等。“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新的历史要求，完善中国的制度改革，推进制度创新成为我们现在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在为期三天的议程中，北京论坛开设了五个分论坛。主题分别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机遇与挑战”、“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和知识共享”、“地区合作与冲突：多元文化的视角”、“中国与世界环境保护四十年：回顾、展望与创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多样性”。此外大会还设置了题为“保护的新希望”学生论坛、有关“水与可持续文明”的圆桌会议、以“东西方文明的对话、理解与互识”为主题的联合国文明联盟专场、以“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为主题的美国圣母大学专场、以“可持续与均

衡发展的社会企业：东亚的视角”为主题的三个专场研讨以及以“后世俗时代中对人类的再思考”为主题的对话活动。

11月3日上午，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第十届北京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落下帷幕。芬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应邀发表主旨报告，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韩国高等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叶茂林分别致辞。闭幕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主持。

埃斯科·阿霍首先发表主旨报告。阿霍认为，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是减少风险和分歧、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好方法，社会和谐发展也有助于经济目标的逐步实现。面对气候变化、人口过剩、教育缺失以及卫生健康领域等方面的全球性问题，首先要树立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只有在国际环境健康和谐的基础上才能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当下应该首要发展的两个领域是教育和卫生健康领域，这对全世界都同样适用。为了更好地运用科技来满足当下人们最紧迫的需求，政府应该重视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最后，阿霍表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不仅是“中国梦”，也是全世界所有人的梦想。

杨荣文发表了题为《各自前行，保持和谐》的主旨报告。他认为，文化是建立文明社会的粘合剂，尊重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是建立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杨荣文提出了创造全面和谐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应对人类共同的威胁；其次，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大家团结到一起；最后，应逐步加大文明间的相互理解。面对多元化的国际环境，杨荣文提出世界需要更多的宽容，需要彼此敞

开心扉，将和谐的圣火传播到世界各地。

王恩哥在致辞中代表北京大学向积极参加论坛并慷慨贡献智慧的各位学者表示感谢，向大力支持论坛举办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为论坛付出辛勤努力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王恩哥说，北京论坛一直以敏锐的视角关注全人类的发展，不仅成为学者们充实学术的重要契机，还为学者们提供了反思与讨论的平台。北京论坛牢牢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探讨文明的普遍价值，以宽广的胸怀欢迎和吸纳各国文化，寻求多元化的文明发展。北京论坛以问题为导向，努力寻求人类发展的方向，留下了各国各界学者的思考印记。他指出，在北京论坛的平台上，各国的繁荣得以呈现，中国的发展问题得到讨论并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借鉴。他希望北京论坛总结与深化讨论成果，继续促成理论的现实转化。王恩哥表示，十年来，北京论坛的筹备与运营日渐成熟，其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有力推动了北京大学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协助北京论坛的举办，并邀请各界人士与北京大学一道为推动论坛的持续发展共同努力。

朴仁国在致辞中表示，北京论坛一直致力于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和亚洲，并从中国和亚洲的角度看世界，从而成为亚洲著名的学术论坛。他用“转变、不确定和可持续”三个关键词对今年会议的主题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在转型与不确定的年代，仍然不能放松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朴仁国希望北京论坛能够着眼于未来，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他说，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北京论坛的发展，并提议北京论坛应加强数字化传播方面的建设，突破时间和地域的局限，从而成为世界顶级的知



识分享平台。

叶茂林在致辞中首先代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他简要回顾了北京论坛举办十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北京论坛已成为北京市开展教育国际合作的一面旗帜。叶茂林强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高度重视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将进一步扩大首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支持高端学术活动。他表示，北京市教委作为北京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将一如既往地在北京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精诚携手，努力使北京论坛在下一个十年中越办越好。

北京论坛创办于2004年，每年举办一次，

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迄今已有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多位政要和知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以北京雄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共性问题的研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图们江论坛 2013 召开

2013年10月21日上午，图们江论坛2013在延边大学科技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召开。来自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及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蒙古等国家的245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延边大学校长朴永浩、吉林省经济技术合作局党委书记李铁、延边州副州长谷金生、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韩国文化财委员会委员长金正培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延边大学副校长崔炯谟主持了论坛开幕式。

朴永浩首先致开幕辞。他说，本届“图们江论坛2013”国际会议，顺应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新的尝试，在论坛的名称、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和扩充。他对本届论坛提出三点期望：第一，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更加广泛地吸纳国内外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促进“政产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第二，进一步加强对国际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为图们江区域建设与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服务；第三，进一步扩大图们江论坛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为把图们江论坛打造成国际社会知名品牌论坛做好舆论准备。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晓、韩国学术院院士金相容、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孙春

日分别作了题为《东亚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困境》、《为东亚和平建言》、《东北亚诸民族跨国流动的历史景观与话语对峙》的主旨演讲。论坛召开期间，与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人士，围绕东北亚区域的投资合作、学术交流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0月22日上午，论坛闭幕。延边大学社科处处长金河禄主持闭幕式。延边大学副校长崔炯谟在闭幕式上致辞。他说，本届图们江论坛以“交流合作、和平共荣”为主题，增设了“政产学”圆桌会议这一新的尝试，旨在为政府部门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与支持，为相关企业在投资方向与国际合作方面提供咨询，促使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与课题研究方面更为有效地服务社会。在对话与交流过程中，学者们的多元文化、不同观点发生了交锋，碰撞出新颖的思想火花。日后，“图们江论坛”将继续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让不同国家，在文化、经济等不同领域存在不同观点的学者，有一个表达对话和交流的场所，以期对图们江地区的和谐与发展作出贡献。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金强一在闭幕式上对本届论坛做了总结。他说，与往届论坛相比，本届论坛规模扩大，论坛内容有所扩充，



朴永浩



李铁



朴仁国



崔炯谟



金强一



李晓

除语言文学与历史文化等传统分论坛之外，增加了政治、跨界民族等新的分论坛，关注的议题也进一步契合地区局势与区域热点，吸纳了更多从事图们江区域研究的学者参与论坛，并增设了图们江现实问题的研究内容。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及日本、韩国、俄罗斯的学者，对东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问题做了深刻的研究，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构想。图们江论坛将始终致力于探索、谋求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和平、合作、共同发展，为促进这一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

图们江学术论坛创办于2008年，论坛的主题为“多元共存与边缘的选择”。本届论坛增设了“政产学”圆桌会议，致力于探讨当前背景下图们江流域的跨境合作的现状及前景，论

坛的中心议题为“交流合作，和平共荣”，论坛自此更名为“图们江论坛”。本届论坛设立了以“文化、历史、法律、经济、政治”为研究领域的分论坛，主题分别为“东亚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图们江的历史变迁与历史叙述”、“图们江区域各国法律制度的理解与合作”、“东北亚经济发展与图们江区域开发”与“新时期图们江区域合作与政治环境”。

摘自 <http://www.ybu.edu.cn/news.php?id=1678>

“国际儒学论坛 2013” 召开

2013年11月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国际儒学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开幕。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荷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副校长杨慧林、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韩国成均馆大学荣誉教授李东俊,日本东京大学荣誉教授池田知久等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杨慧林副校长主持。

陈雨露校长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本次国际儒学论坛以“儒家思想”与“理想之治”为关键词,深入讨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理想以及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重视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重视政治智慧的当代价值,主张古代思想智慧和西方政治文明的交流,将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丰富而翔实的前沿材料。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认为,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智慧并不是历史遗迹,而是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各国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同时也影响了东亚各国的政治理念与社会秩序,探讨儒家理想之治的现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张立文教授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

从古代政治集权与分权交替的社会模式探讨中,对现代政治制度做出考察,认为现代政治制度,基本上有五种模式:一是全以集权为体;二是专以分权为体;三是以集权为体,分权为用;四是以分权为体,集权为用;五是集权与分权互体互用,相互协调,融突和合。集权与分权这五种模式,影响着全球人的日常生活,关系着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荣誉教授李东俊、日本东京大学荣誉教授池田知久,也在大会上发表了讲演。

本次论坛会期3天,包括大会和分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儒家与理想之治”。与会学者就“儒家思想与理想之治”、“中西理想政治哲学模式”、“儒家的正义观”和“儒家政治哲学对海外影响”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国际儒学论坛于2004年创办,每年举行一届,如今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儒学盛会。国际儒学论坛自创办起,便坚持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致力于推动东亚和世界的儒学研究交流。

摘自 <http://news.ruc.edu.cn/archives/70721>

“中韩教育交流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 暨李岚清著作赠书仪式在首尔举行



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在赠书仪式上致辞。驻韩使馆教育参赞艾宏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以及中韩两国高校的校长、教授代表共计 150 余人参加了活动。

赠书仪式上，由中国教育部、中国驻韩大使馆、中方高校的领导向韩方嘉宾赠送了《中国印·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展作品集》(韩文版)、《为了 13 亿人的教育》(英文版)、《音乐·艺术·人生》(中文版) 等李岚清著作。

本次活动作为艺术展及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活动，通过回顾中韩两国教育交流的成就，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来自北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等两国高校的校长及教授代表就会议主题进行了发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郭棲庆教授在“中韩教育交流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促进中韩教育交流 架设中韩友好桥梁》的发言。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下午，“中国印·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展”系列活动之“中韩教育交流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暨李岚清著作赠书仪式在韩国首尔艺术殿堂举行。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大使张鑫森、韩国教育部次官罗承日、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巡视员刘宝利、韩国 SK 集团副会长金在烈、韩国留华博士联谊会会长李映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首尔国立大学代理副校长郑钟昊、

“中国文化与亚洲的价值” 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3年10月18日至19日，“中国文化与亚洲的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香港大学文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协办。国内外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斯里兰卡教育部部长古纳瓦德纳，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雷金

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严绍缙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彭龙主持。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会长张西平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朴宰雨教授，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和东



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教授分别作了《中华文化的价值思考：论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亚洲》、《重新思考李光耀与金大中的亚洲价值论争》和“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a Studies in India”的主题报告。

研讨会设两个分会场，共安排7个场次小组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文化与亚洲价值”、“汉学与中国文化”、“汉学研究在世界：亚洲”、“汉学研究在世界：欧洲”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在闭幕式上，深圳大学印度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中国研究副修课程主任李焯然教授和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巴萍教授分别作了《中国文化和人类前途》、《传说与真实：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和“A Sketch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ailand”的主题报告。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交的高质量论文30余篇。会议突出亚洲国家与中国文化的密切联系，探讨中国文化在亚洲的普遍意义，对于促进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理解互信，增强中国与亚洲国家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落实中央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次会议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化报、京华时报、人民网、对外传播等媒体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东亚文化交流的过去·现在·未来” 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3年11月2日上午，“东亚文化交流的过去·现在·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主办，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协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日本法政大学等国内外2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

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博士生参会。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主任邵建国主持。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日本法政大学川村湊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分别作了题为《从布莱基斯顿线看“线”和“墙壁”》和《战后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体制——



以日本为视角》的主题演讲。本次研讨会开设的3组分论坛分别是：“日本语言·日语教育”、“日本文学·社会文化”、“博士生论坛”。同时，还专设了“MTI 教学与实践论坛”与“日本文学教育论坛”。

与会专家在各个论坛上讨论热烈，现场气氛活跃。在日语翻译专业硕士 (MTI) “教学与实践论坛”中，杏林大学塚本庆一教授、神户松荫女子学院大学古川典代副教授，北京大来创杰咨询有限公司万红总经理、职业译员朱晓辉等分别从教育者、市场、译员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外中日文翻译市场的现状及对翻译人才的要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杨玲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关立丹教授、厦门大学吴光辉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孟海霞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于日平教授等以各自学校的经验为例，分别提出了日语翻译专业硕士 (MTI) 教学与实践

所面临的问题，并与参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解决方案。在“日本文学教育论坛”中，北京师范大学王志松教授、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张龙妹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文颖教授等以本科生、研究生阶段的日本文学专业教育为中心，就“日本文学教学的定位”、“日本文学教学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文学教学与日语教学的关系”、“文学教学与人文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强调文学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读什么”和“怎么读”。

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对日语教学的改革和日语学科的建设发展方面意义深远。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



“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 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3年12月7日，“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举行。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主办、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协办，并得到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的支持。来自外交部、文化部、对外友协、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文出版社、《人民日报》、《今日中国》、中国网等单位的领导与新闻工作者，国内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半岛电视台、中东通讯社、《生活报》等阿拉伯著名媒体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姜绪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主任薛庆国主持。外交部亚非司周攀在主旨发言中阐述了我国的中东政策及对发展中阿关系的立场。在“第三届全国高校阿拉伯语演讲比赛”中获得佳绩的阿语系同学展示了题为“假如我是

驻阿拉伯国家记者”的演讲。

研讨会分设三个议题：“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国际传播建设的成效与不足”、“阿拉伯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阿媒体合作的现状与未来”。与会中阿学者与媒体从业者从多个角度，围绕议题进行了研讨，既总结了中国对阿传播中取得的成绩，又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会者对改进中国对阿传播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中外媒体的代表还利用会议契机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网、人民日报、今日中国等从事阿拉伯传播的媒体，对会议作了专题报道。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

“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文化传统” 系列学术讲座连续举办 6 场

2013 年 9 月至 12 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共同举办 6 场“跨文化视野下的东亚文化传统”系列学术讲座。分别邀请著名学者、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田庆市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朴宰雨教授，韩国著名学者、东亚西亚文明研究所理事长全洪爽博士，著名学者、台湾大学历史系古伟瀛教授，加州柏克莱大学文学博士、杨百翰大学人文科学院韩大伟教授，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华研究中心研究员洪浚浩教授等作了题为《新发现的琉球官话材料——日本关西大学长泽文库藏〈中国话会话文例集〉》、《东亚文化经验：韩中文化文学互动百年》、《东亚模式的转换：中世化论和真景文化——以探索“东亚国际公共性”为中心》、《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欧洲接受对中国的了解的学术背景：文献学、哲学及科学》与《国际传播与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的机会与挑战》的讲座。

内田庆市，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关西大学中国语学文学博士、文化交涉学博士，曾任日本福井大学、关西大学教授，现任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馆长。近年来，他以近

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和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课题，以 17 世纪至 19 世纪的欧美传教士为中心的“欧美资料”为参考，对当代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另外，他将日本（含琉球群岛）、朝鲜等所谓周边地区中的“官话”教育和研究与西方人的“官话”合起来加以考察，力图探求“官话”本体。著有学术论文《卫三畏在汉语语言学上的贡献》、《近代中国人编的英汉字典的谱系》、《近代西洋人汉语研究——汉语语言学的“周边”研究法》，著书有《文化翻译或周边诗学》、《文化交涉学和语言接触——中国语言学的周边的方法》等。

朴宰雨，毕业于国立首尔大学中文系，随后在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获硕士与博士学位。从 1983 年就任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至今，先后担任过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主任、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韩中文化论坛组织委员长等职，现为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会韩国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季刊《当代韩国》韩方主编以及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朴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曾在海内外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50 多次，在韩国及海外各大高校举行讲学 30 多次，著书译作甚多，在韩国与中国文学及

其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中枢性作用。著作有《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文专著)、《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论》(中文专著)、《中国文化的理解》(编著)、《如何学习中文学》(韩文合著)、《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中文合著)、《中国寓言选》(编译)等,论文有《鲁迅在韩国:接受脉络与社会影响》(中文)、《韩中现代文学交流史考》(韩文)、《韩中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历史与现况以及课题》(中文)等。

全洪奭,毕业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获得中国文化哲学博士学位。著有《朱谦之“文化哲学”研究》以及中世化论相关著作。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韩教育与文化交流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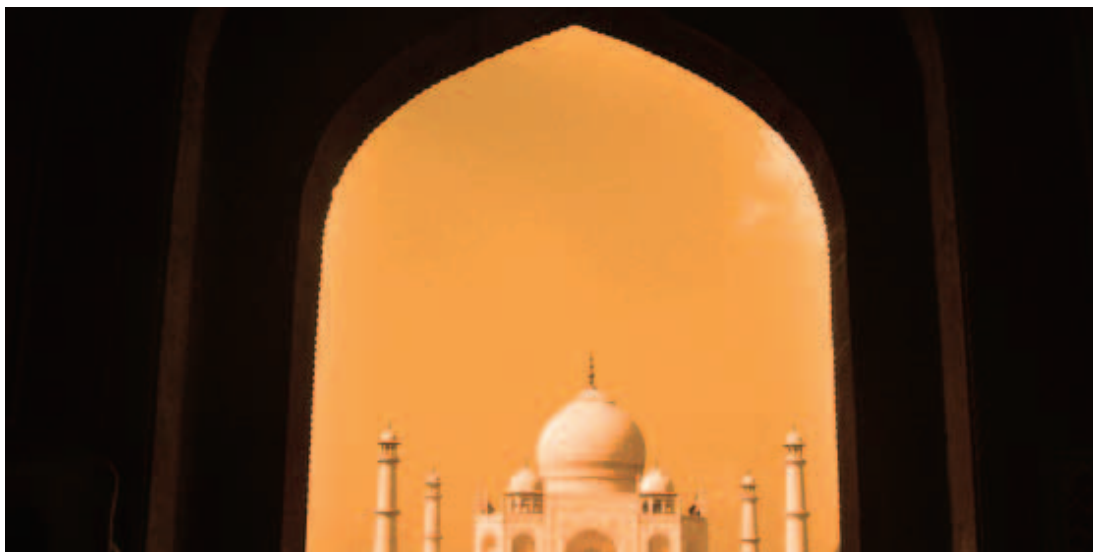
古伟瀛,1946年生于台北。1969年6月获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1973年6月获台湾大学史学研究所近代史组硕士学位,1983年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1997年,任台湾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曾为美国密歇根大学、德国马堡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等院校的访问学者,以及日本交流协会的历史研究者。现为台湾大学专任教授,讲授史学方法论、中国近代史、英文史著、专治中国近代天主教会史和史学方法等课程。在后现代主义史学、中国天主教史、

中国教会大学史方面建树颇多。著有《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合著)、《台湾天主教史研究论集》《台湾天主教史料丛编》等,其中《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为中国介绍后现代史学的经典著作。

韩大伟,1974年曾到香港传教两年,精通广东话和国语。多年来致力于从五胡十六国直到辽代的北方民族政治史,中西方经学研究等,主要著作有:《顶礼膜拜:汉学先驱和古典汉语文献学的发展》和《西方经学史概论》等。

洪浚浩曾在国内主要媒体工作多年。1988年出国留学,1990年获加拿大温莎大学传播学硕士,1995年获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体与社会发展等。近年来致力于全球传播体制与各国传播政策和媒体的研究。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印度私营企业国际化对中国的启示¹

董丽丽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摘要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鼓励本土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呈现迅猛的增长态势，而且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其中，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类型、主体的核心竞争力和海外扩张方式等方面所呈现的差异较为突出。总体上，印度更具有投资主体的微观竞争优势。印度政府在鼓励国内私营企业“走出去”方面颇有成效，有不少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笔者从所有制形式出发比较了中印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的特点，并着重探讨行成这一差异的母国环境因素，由此提出促进中国私营企业“走出去”的建议。

关键词

中国 印度 对外直接投资 私营企业

1 本文为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印度私营企业国际化对中国的启示》的研究成果。

中国政府于2000年正式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旨在推动本土企业向海外市场扩张业务，以增强本土企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自这一战略实施以来，已有不少中国企业迈向国际市场，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较快的增长。但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上的成绩并不能掩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失衡的问题——私营企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构成中占比偏低，而且贡献率不高。这一结构失衡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发展。而近年来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同样表现出强大发展势头的印度，虽然在投资总量上还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其投资主体的构成却更趋合理——私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国际市场上表现突出，效益较高。因此，我国政府可学习和借鉴印度政府在促进私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经验，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私营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

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研究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构成在所有制形式方面的差异以及探究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从而学习印度政府在鼓励国内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方面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为我国政府更有效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出建议。

一、中印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比较

（一）中印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的比较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所有制形式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以私营企业为主，但国有企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则尤其明显。很多研究数据表明，国有企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体地位，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以私营企业为主导。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Vale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于2010年12月联合发布了“2008年中国非金融机构跨国企业排行榜（按海外资产）”¹。入围的18家企业中除联想集团和海尔集团外，其余16家均为国有控股企业，其中13家更是属于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而在Vale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与印度商学院（The Indian School of Business）于2009年联合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评选出的“2006年印度前24家跨国企业（按海外资产）”²，只有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 Videsh Ltd.）是国有性质的，其余23家均为私营企业。

具体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所有制形式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为主，呈现出较多的政府干预成分。这种现象在能源、金融、运输等行业尤其突出。近年来，随着私营企业在我国对外投资领域日趋活跃，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没有改变其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体地位。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其中私营企业对外投资3.45亿美元，仅占0.6%。

而印度的私营企业则发展成熟，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中一直以本土发展起来的大型私有企业为主，其国内排名前十位的跨国公司全部都是本土的私营企业。一批如塔塔集团（Tata Group）、信实工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和威罗普公司（Wipro Limited）等颇具国际竞争力的印度私营企业，不仅在国内关键产业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成为推动印度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表1记录的是2000—2007年印度企业进行的25宗最大的跨国收购交易。在这25宗跨国收购的投资者中，只有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 Videsh Ltd）

1 "Chinese Multinationals Gain Further Momentum", Vale Columbia Center on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nd New York, 2010年。

2 "The Growth Story of Indian Multinationals", Vale Columbia Center on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dian School of Business, Hyderabad and New York, 2009年。

表 1 2000-2007 年印度企业进行的前 25 宗大型跨国收购

排名	价值(单位:百万美元)	印度企业	目标企业	东道国	年份
1	12100	Tata Steel	Corus Steel	英国	2007
2	6000	Hindalco	Novelis	美国	2007
3	1400	ONGC Videsh	Petrobas	巴西	2006
4	766.1	ONGC Videsh	Greater Nile Oil Project	苏丹	2002
5	677	Tata Tea and Tata Sons	Glaxo	美国	2006
6	600	ONGC Videsh	Greater Plutonio Project	安哥拉	2004
7	600	Opto Circuits India Ltd.	Eurocor GmbH	德国	2004
8	570.3	Dr. Reddy's	Bet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德国	2006
9	565	Suzlon Energy	Hansen Transmissions	比利时	2006
10	522	Kraft Foods Ltd.	United biscuits	英国	2006
11	431.2	Tata Tea	Tetley Group	英国	2000
12	324	Ranbaxy Laboratories Ltd.	Terapia SA	罗马尼亚	2006
13	323	ONGC Videsh	Sakhalin-I PSA Project	俄罗斯	2000
14	300	Ispat Industries Ltd.	Finmetal Holdings	保加利亚	2005
15	289.2	Videoc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SA (CRT business)	欧洲、中国	2005
16	283.7	Tata Steel	NatSteel Asia Pte.	新加坡	2004
17	254.3	VSNL Ltd.	Teleglob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美国	2005
18	234.7	Matrix Laboratories	Docpharma NV	比利时	2005
19	220	Tata Coffee	Eight o' Clock Coffee Co.	美国	2006
20	210	Susken Communication Tech Ltd.	Bornia Hightec	芬兰	2006
21	209	Ballarpur Industries Ltd.	Sabah Forest Industries	马来西亚	2006
22	191.2	Reliance Infocomm	Flag Telecom	美国	2003
23	185	Seagate Tech Ltd.	Evault Inc.	美国	2006
24	184.6	Citrix Software India Pvt. Ltd.	Sequoia Software	美国	2001
25	175	Tata Steel Ltd.	Millenium Steel Plc	泰国	2005

(数据来源: Lakhwinder Singh, Varinder Jain. Emerging Pattern of Indi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ate Policy: A Macro View. MPRA Paper No.13458, posted 17 February 2009: 10)

和印度国外通讯有限公司(VSNL)¹为国有企业。由此可见,印度私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表现比国有企业更为活跃,贡献率更大。(见表1)

(二)中印投资主体在国际市场的表现

1. 竞争优势

国有企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者,但大部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都因为得到来自政府或国资委的资金和信息支持才具有“走出去”的实力。这些企业本身存在不少缺陷,并缺乏独特的竞争优势。此外,这些企业的优势还主要源于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而获得的优先配置和廉价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换言之,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优势主要来自于政府的帮助和国内市场的要素禀赋,而非企业特定的所有权优势。而在我国的私营企业中,已有一批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如我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曾于2007年10月参股为五角大楼和美国陆军提供入侵检测设备的3COM公司,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大部分私营企业仍然缺乏企业特定优势和非企业特定优势。我国私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足,加上现时我国的政策环境还存在不少不利于私营企业成长的因素,导致私营企业缺乏“走出去”的优势,而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也较低。

1 该公司已于2008年2月13日被塔塔集团收购,并更名为塔塔通信有限公司(Tata Communications Ltd.)。

相比之下，印度私营企业则拥有较多的企业特定优势。联合国贸发会在2006年进行的全球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调查显示，受访的印度企业中多达30%认为自身竞争优势来自于技术和专业知识，而46%企业认为生产流程是其优势，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平均水平（见表2）。这两种优势均为企业特定优势，而且技术与专业知识更是属于海默（Stephen H. Hymer, 1934—1974）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中的要素市场不完全造成的优势之一，为企业特有的所有权优势。由此可见，印度对外投资主体总体上更具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和潜力。

简而言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总体上缺乏所有权优势，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在开发和培养核心竞争力方面则表现更佳。

2. 海外扩张的目的

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动机以寻求自然资源满足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主，亦有部分企业开始在海外市场寻求创造性资产。例如，2004年联想整体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主要就是为了获得IBM的先进技术和品牌效应。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别于四种典型的海外扩张动机，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投资者更多时候是由于国家宏观战略和政治目标的驱使而进行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一方面受到国家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其业务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国家的管制。我国政府一般会给国有企业分配海外投资的目

表2 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与印度跨国企业竞争优势分类比较（按产业）

		发展中国家（百分比） ^a	印度（百分比） ^b
竞争优势类型	对资源和资产的所有权和获取优势（所有权优势）	第一产业：25	第一产业：（无数据）
		第二产业：22	第二产业：23
		第三产业：27	第三产业：31
		所有产业：24	所有产业：30
	产品/服务生产流程产业链定位	第一产业：42	第一产业：（无数据）
		第二产业：38	第二产业：53
		第三产业：31	第三产业：41
		所有产业：35	所有产业：46
	关系人际网络	第一产业：17	第一产业：（无数据）
		第二产业：29	第二产业：19
		第三产业：27	第三产业：22
		所有产业：28	所有产业：20
	组织结构企业文化	第一产业：17	第一产业：（无数据）
		第二产业：11	第二产业：7
		第三产业：14	第三产业：6
		所有产业：13	所有产业：5

（数据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注：

- a 联合国贸发会在全球选取了250家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进行调查访问，其中45家企业就“列出自身最主要的三个竞争优势”这一问题进行了反馈。该项百分比是在对这45家企业按其所从事的产业类型进行分类后，对企业列出的优势进行分类统计所得出的结果。
- b 共40家印度跨国企业（当中没有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就“列出自身最主要的三个竞争优势”这一问题进行了反馈。该项百分比是在对这40家企业按其所从事的产业类型进行分类后，对企业列出的优势进行分类统计所得出的结果。

标，而这些目标既包括寻求海外的自然资源和技术设备，亦包括维持与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及西亚等重点地区的良好关系。例如，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投资存量已超过100亿美元，涉及矿业、制造业、农业等多个领域。目前，非洲已跃居我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标地。在此目标的影响下，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仍然以发展中

国家为主。

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为市场寻求型和创造性资产寻求型。印度私营企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是获取新的技术与专利、战略性资源（如品牌）以及更广阔的分销渠道。例如，2006年著名的印度私人财团米塔尔钢铁集团（Mittal Steel Group）斥资320亿美元合并了卢森堡的阿塞洛（Arcelor）钢铁公司，就是为了获得后



者在采矿方面的优势，生产多种高附加值钢产品的能力，以及强大的研发实力。在这一主要动机的影响下，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呈现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特点。《2004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印度前 15 家软件技术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几乎全都集中在发达国家。¹ 此外，寻求自然资源也是印度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推动力之一：在 1996—2004 年间印度 19% 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美国，18% 流向了俄罗斯。² 投资在美国的印度企业主要是为了获得创造性资产和更大的市场，而投资在俄罗斯的印度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自然资源。

综上所述，两国对外投资动机在获取自然资源这一点上比较相似，但

是相对而言，印度企业在创造性资产寻求性投资上面的表现更加突出，而中国企业的投资则更多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战略的影响。

3. 海外投资绩效

中印两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上的差异，以及两国投资者在上述的竞争力和投资动机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两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扩张的效益亦有所差异。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为国有企业，其投资的行业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并且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因素的驱动，对投资项目的评估不够严谨，失败的投资个案数不胜数。据媒体报道，中国平安、TCL、中国铁建、中钢集团、上汽集团、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都出现过海外投资巨额亏损。另一方面，我国的私营企

业则因为自身竞争力不足、融资困难、信息匮乏等因素，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呈现出目标不明确、规模偏小等特点。以上原因综合起来导致了我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总体上效益较低。

与中国海外投资相比较，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体地位的私营企业注重培养和增强技术、生产管理 etc 所有权优势，发展如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投资经济附加值、利润率较高的行业。高效运作的私营企业大大提高了印度海外投资的绩效与收益。

此外，国际社会对跨国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有一定的偏好，这也成为了中印两国海外投资效益差异的原因之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是来自政府的扶持，而自身存在较多的缺陷。因此，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通常较易引起潜在东道国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市场竞争公平性的担忧，从而使国有企业的跨国投资面临更多来自潜在东道国的排斥情绪。而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更是加大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阻力。中海油曾出资 185 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大型石油公司，但因为中海油为国有企业、在收购时得到母国政府的支持，而最终并购失败。相比之下，印度的塔塔集团从 2004 年开始大规模进行海外并购，一路上受到的海外阻力都较少，并于 2007 年成功收购了英

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04, Annex Table A.I.15.

2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04, Annex Table A.I.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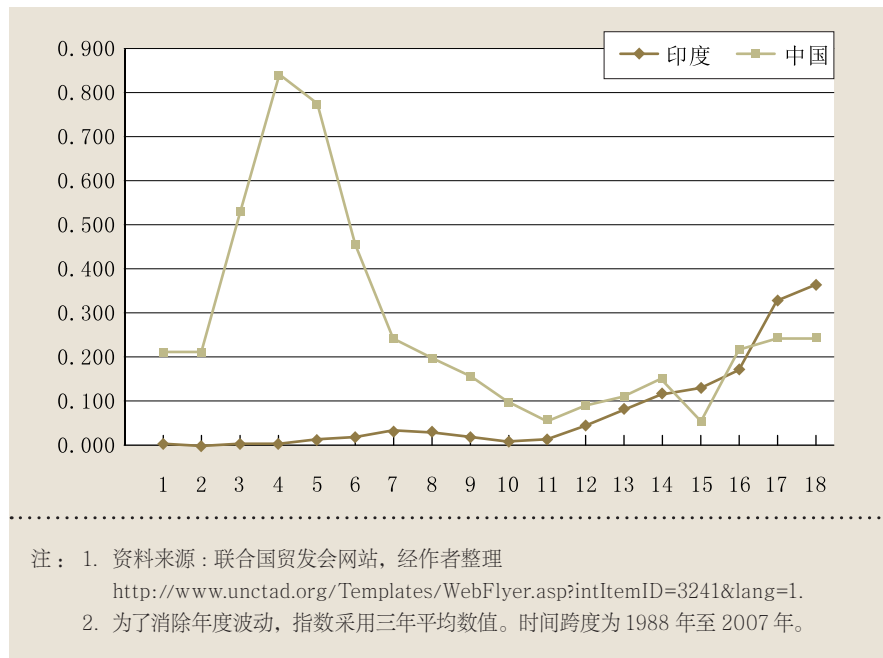
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康力斯 (CORUS) 集团。受到这一政治因素影响, 相比起中国企业, 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联合国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 (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用于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程度, 计算方式为: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 与其 GDP 在世界 GDP 总额中所占比例, 两者的比值。该指数排除了经济规模的影响, 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国企业在竞争优势方面的差异, 以及国家之间区位因素的影响。图 1 为 1988 年至 2007 年, 中印两国 OFDI 绩效指数的对比。2005 年之前大多数年度, 印度的绩效指数低于中国, 但自 2006 年起, 印度超过中国。此外, 从两国的发展趋势看, 印度的绩效指数始终稳步上升, 而尽管采用了三年的平均数值以消除年度波动, 中国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上下波动。这与中国对外投资项目大多属是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 单笔项目金额较大有很大关系。而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由私营企业资助进行, 表现出更强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二、中印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差异的原因分析

前文从所有制形式方面分析了中印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的差异, 以及这一差异造成的两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方面的特点。这部分将从社会因素、

图 1 中国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比较



政策原因、融资环境和信息支持等方面来重点分析造成中印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巨大差异的原因。

(一) 社会因素

从私营企业在两国的发展历史与地位来看, 印度的私营企业较中国的私营企业更有先天优势。印度私营企业的发展历史悠久, 早在殖民主义时期就建立了私人企业经营制度。在印度独立后至 1991 年印度经济改革之前, 私营企业在国内的发展曾受到了许可证制度带来的诸多限制。但正因如此, 当时已有不少私营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米塔尔钢铁集团就是因为当时国内钢铁行业竞争激烈而政府也从多方面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 所以从 1975 年便开始在海外设厂并收购经营

困难的钢铁厂以发展其业务。在 1991 年开始的一轮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为主题的经济改革中, 印度政府把私营企业的发展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 允许私营企业进入除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的任何关键性的领域, 从而成功地培养出一大批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私营跨国集团。发展至今, 印度规模最大的 500 家公司中超过 75% 属于私营企业, 而在信息技术、电信、电力、石油化工、钢铁、汽车、制药、地产等产业领域, 更是几乎均由印度私营企业掌控。另外, 印度社会对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的提倡, 使私营企业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 鼓励了不少印度精英就职于私营企业。

反观中国, 私营企业在历史上一

直受到来自外来资本和政府所有性质的企业的挤压，发展艰难。在解放初期，私营企业更是被视为影响公有经济发展的一个干扰因素而受到严重打压。后来，我国政府意识到私营企业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逐渐赋予私营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私营企业在我国经济里的地位和比重也日渐增加。但时至今日，我国多个领域仍然只对国有企业开放，如电信、能源、运输等行业一直把私营企业拒之门外。而且不少政策仍然是带有所有制歧视性质，人为地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区别起来。因此，我国在多个领域缺失实力雄厚的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的潜力和实力亦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政策原因

第一，市场开放的力度

在国民经济关键性领域对私营企业开放的力度上，中印两国差异甚大。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其中包括向私营企业开放国内除基础设施建设外的所有行业。这有助于不同领域的私营企业在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培养自身的竞争力和竞争意识，目前印度国民经济中多个关键领域已是私营企业占绝对优势了。能源方面，印度的电力系统被塔塔集团与信实工业集团掌控，国内最大的石油勘探商也是属于信实工业集团的。

中印两国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格局的巨大差异也是造成两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以及其竞争优势不同的原因之一。

冶炼方面，私营企业 Hindalco 铝业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综合铝制品生产商；米塔尔钢铁集团则生产了印度 50% 以上的钢铁，规模位列全球第一。在其他领域，私营企业也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印度最大的私营航空公司捷达航空占据了国内航空市场 46% 的份额；印度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是私营企业 DLF 地产公司；Infosys 技术公司和 Wipro 公司每年的软件出口额占了全印软件出口额的 40% 以上。¹

中国的情况则是完全相反——国有企业在国内关键性领域仍处于垄断地位。我国仍有 20 多个行业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如电信、钢铁、运输、商业银行等。虽然我国正加大力度改革金融业，但对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还是显得十分谨慎小心。这导致在众多关键领域中，私营企业没有被赋予充分培养竞争力的空间。因此，我国缺乏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私营企业与印度私营企

业在国际市场的关键领域上抗衡。

第二，产业政策

中印两国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格局的巨大差异也是造成两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以及其竞争优势不同的原因之一。制造业在印度国内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16% 左右；但印度的服务业却在过去 20 年间有了很大的增长，在 2004 年已达到 51.8%。印度政府重视资本密集型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出台了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国民在该领域创业，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如税收减免、税收扣除与加速折旧等。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经济政策向第二产业倾斜，2004 年我国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已接近 53%²。在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依靠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而获得快速的发展。由于第二产业对资金和自然资源的投入要求较高，加上政府出于国民经济安全考虑而重点扶持国有企业，所以私营企业在第二产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举步维艰的。相比之下，政府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则略显不足，但我国也逐渐重视促进第三产业的企业“走出去”。2004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措施，其中包括：若企业投资的项目能减少国家自然资源短缺的风险，

1 唐焯、王文清：《看印度私营企业如何长大》，载《解放日报》2010 年 4 月 10 日。

2 白远、刘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与印度的比较》，载《国际经济合作》，2006 年第 6 期，第 11-14 页。

或能促进国内技术、产品、设备和劳动力的出口，或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或能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加速其海外扩张的进程，则能享有政府提供的优惠贷款及其他鼓励性优惠。

第三，人力资源政策

印度政府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投资创建了“科学人才库”，负责接纳愿意回国工作的印度人；在 2003 年更开始实行对等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允许当前居住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印度裔人士拥有双重国籍，并允许他们在印度国内生活、工作以及购买房产。这些政策极大地鼓励了海外人员回国，为国内的私营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另一方面，杜克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内，在移民创建的美国科技企业中，26% 的企业拥有一名印度裔创始人，比例超过英国、中国和日本裔创始人的总和，¹ 这为印度私营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网络条件。

而我国人才流失的问题却日渐严重，政府吸引海外人员回国就业的政策仍需改善。此外，由于管理法规未尽完善、监管力度不足等原因，我国不少私营企业的雇主没有严格按照《劳动法》保障雇员的利益，导致私营企业员工的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案件较常出

相比之下，中国金融体系给以私营企业融资的支持则显得较为无力。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而“国有商业银行长期担负着为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任务，把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作为服务重点”，对私营企业普遍采取所有制歧视的态度。

现，令求职者形成了到福利保障比较完备的国有企业就业的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私营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困难。

（三）私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总体来说，印度私营企业面对的融资环境较中国私营企业面对的更友善。世界银行曾对全球商业环境进行过一次调查，其中 80.21% 的中国企业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只有 52.1% 的印度企业有此困扰。²

印度的银行体系已有 130 多年的历史，金融体系运转良好，监管制度健全，接近世界标准。印度的商业银行体系拥有 27 家政府银行，25 家私人银行，46 家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

机构 4.7 万家（多为私营）。这些商业银行的贷款中只有 35% 是给政府和政府公司，其余的 65% 都是给私人 and 私营企业。³ 资本市场方面，印度有由 23 个股票交易所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股市透明程度较高，管理也比较有效，现时全国共有上市公司一万多家。此外，印度政府还在 2006 年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海外投资的长期战略，逐步放宽对本国企业海外融资的限制，以支持本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印度央行也逐步简化了印度公司的海外投资手续，并大幅放宽了投资限额。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而政府的政策帮助则使印度私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更为良好。

相比之下，中国金融体系给以私营企业融资的支持则显得较为无力。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而“国有商业银行长期担负着为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任务，把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作为服务重点”⁴，对私营企业普遍采取所有制歧视的态度。虽然近年来中央银行已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政策，但银行普遍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对私营企业惜贷，甚至对额度小、频率高的私营企业贷款采取忽视的态度。一些民营企业为了满

1 唐焯、王文清：《看印度私营企业如何长大》，载《解放日报》2010 年 4 月 10 日。

2 同上。

3 国信观点：<http://www.docin.com/p-37083642.html>，2011 年 3 月 6 日。

4 丁铭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 年第 12 期，第 22 卷。

足融资的需要，不得不采用如“地下钱庄”等非正式的融资途径，从而增加了企业负担和融资的成本和风险。另外，我国资本市场缺乏适合私营企业融资需求的产品，阻碍了他们海外扩张的步伐。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重点还是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融资，基本上未向私营企业开放。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股本总额不得少于5000万元。而我国绝大部分私营企业的资金实力与这一上市条件相差甚远，因而被股票市场拒之门外。由此可见，我国现时的融资环境难以满足私营企业技术改造、提高核心竞争力，以及向海外市场扩张的融资需求。

（四）信息支持

印度的私营企业在国内能获得更为细致、具体的信息支持。印度政府设立了多个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构，为印度企业的海外扩张提供决策支持。其中，印度联邦商会（The 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主要通过为企业提供市场环境调查报告、与国家政要的频繁互动以及打造全球化的企业网络等方法，来提高印度企业的竞争力和扩展它们在全球的业务范围。印度合资企业委员会（India's Joint Business Councils）在全球超过6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以帮助印度企业发掘更多国外市场的机会。此外，亦有不少民间组织起来的促进企业间实现信息共享的咨询委员会，从而减少企业因信息不对称而蒙受的损失以及搜集信息的成本。



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对私营企业的信息支持则显得较为空泛。一方面，政府将不少市场信息定性为国家机密，不轻易向私营企业公开。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私营企业的信息支持服务不够细致。现时政府设立了不少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会，商务部的外资司还专门提供投资服务，在其官方网站上特别设有“走出去服务专网”。但这些机构和网站所提供的信息都较为空泛，以国家的宏观政策为主，缺乏对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信息。

以上从社会、政策、融资环境以及信息支持四方面分析了印度私营企业比中国私营企业更具有“走出去”的实力的原因。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

接下来将会探讨我国应如何借鉴印度政府在促进私营企业“走出去”方面的经验，以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三、印度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启示

促进私营企业“走出去”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关键。一方面，目前我国私营企业的总数已达750多万家，占全国法人企业总数的70%以上，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应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大部分国有企业是在政府的资金或政策的帮助下才得以进行海外扩张的。这种依靠外力推动而进行的扩张不能持久，而且容易引起潜在东道国的排斥和打压。所以，鼓励私营企业走出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政府应借鉴印度鼓励私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从而更有效地鼓励我国私营企业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一）适当开放关键性领域，改善我国私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印度国内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其私营企业能在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完善的竞争机制中培养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为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要促进私营企业“走出去”，也应适当开放如金融、能源、电信等关键领域，允许私营企业在这些领域与国有企业竞争，从而赋予私营企业更多的成长空间。另外，由此向这些部门引

入竞争机制，亦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二)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为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创造条件

民营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是其“走出去”的实力和潜力的关键所在。我国现时成功“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大多都是信息技术产业类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如已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成为佼佼者的华为技术设备有限公司，在2005年时已在财产合作协议(Property Cooperation Treaty (PTC))中拥有249项专利设计，位列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第三名。¹我国政府应学习印度政府，加大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为企业形成所有权优势创造条件。例如，可向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兴建研发中心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

第一，鼓励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引导民营企业向发达国家投资。

第三产业对资金和自然资源能源的投入要求相对较低，而且具有平稳发展的特点。同时，第三产业的企业较易形成所有权优势，更有助于企业进行海外扩张。印度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形成鲜明的以信息服务业为主导的投资格局，在这种格局的影响下，印度企业的投资目的国也逐渐由邻近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而发达国家良好稳定的投资环境、先进的技术以及潜力较大的市场，都为印度



民营企业实施资产增强战略提供了条件，推动了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国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亦可向第三产业倾斜，培养对外投资国际竞争力的新增长点。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投资，可以较快地从发达国家获得已开发的先进技术，能在较短时间内增强我国民营企业的创造性资产。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为民营企业创造宽松的融资环境，帮助它们获得足够的资金实力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

第二，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计划的实行。

我国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就必须为其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一方面，我国应建设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满足资本实力不同的各个层次的企业“走出去”的

融资需求。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应在坚持四大国有银行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适当引入私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更多渠道。而资本市场的产品也应更趋多元化，并适当降低民营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门槛。另一方面，为改变商业银行的“惜贷”行为，国家应向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提供保险，以减少其负担的风险和对资金安全的担忧。

第三，注重高等教育，完善人力资源政策，为民营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吸纳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提高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我国政府不仅要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大量具有科研实力的人才；而且还应通过提高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政策的吸引力，以鼓励更多的人才为民营企

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 for Development", 130.

业“走出去”贡献力量。我国的《劳动法》已日渐改善，将私营企业也纳入所有社会保障的管理范围内，因此私营企业对于求职者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提高。同时，我国也需加紧完善监督机制，规范好私营企业的用人行为。

第四，增加获取信息的渠道，为私营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支持。

为改变私营企业信息匮乏这一情况，政府应增加为私营企业制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咨询机构和投资促进委员会；并通过这些机构为企业提供更细致和具体的信息，而非只有空泛的指导方针。政府也可通过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上为企业提供市场环境调查，减少私营企业搜集信息的

成本。此外，我国政府亦应学习印度方面，鼓励同行业的企业实现信息共享，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相互促进。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应意识到鼓励私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重要性。我国目前大部分“走出去”的国有企业是依靠政府的支持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实力的，而这种所谓的“实力”并不持久。长期下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会受到挑战。印度私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表现证明了印度政府促进私营企业海外扩张的措施颇为有效，有不少值得我国政府借鉴

的经验。当然，中印两国的经济体制不同，现时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是我国经济体制本质的一种反映。要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构成，也不能操之过急或盲目模仿。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不仅涉及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而是牵涉到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产业政策、人力资源政策、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公司法等等。我国政府应辩证地学习印度的经验，通过开放市场、税收优惠、宽松的融资信贷环境等政策鼓励更多的私营企业走出国门，积极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

主要参考文献

1. Lakhwinder Singh, Varinder Jain, "Emerging Pattern of Indi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ate Policy: A Macro View", *MPRA Paper*, 2009.
2.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India",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9.
3.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04.
4.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06.
5.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07, Annex Table A.1.14.
6. "The Growth Story of Indian Multinationals", Hyderabad and New York, 2009.
7. "Chinese Multinationals Gain Further Momentum", Shanghai and New York, 2010.
8. 白远、刘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与印度的比较》，载《国际经济合作》2006年第6期。
9. 丁铭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10. 蓝庆新、张雅凌：《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及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启示》，载《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3期。
11. 李大明、尹磊：《支持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之比较——以韩国、印度、新加坡和台湾为例》，载《涉外税务》2006年第10期。
12. 綦建红、李鸿：《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与启示》，载《亚太经济》2007年第4期。
13. 綦建红、李鸿：《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效应比较》，载《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
14. 唐烨、王文清：《看印度私营企业如何长大》，载《解放日报》2010年4月10日。
15. 王峥、赵曙东：《中印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载《经济论坛》2006年第8期。



论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中的中国形象¹

吕小蓬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摘要

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不仅讲述了越南封建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而且涉及大量与中国封建王朝间的政治、文化、军事交往事件。本文以文本分析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考察现存可见的五部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力图在越南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叙事话语中，解读其文学虚构和文化阐释所建构的作为异国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

越南 汉文小说 历史演义 中国形象

越南民族与华夏民族自古便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无论在血缘上还是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越南有两千多年可考的信史，其中约一千余年曾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治下的郡县；约一千余年它是独立的封建国家，作为中国封建帝国的‘藩属’而存在”。在没有民

族文字的情况下，越南封建社会曾长期以汉字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特别是自李仁宗开始效法中国封建王朝实施科举取士制度后，越南社会逐渐形成了儒士阶层，他们“喜欢用他们中国行家的古典语文来写作”，取法中国文人的写作技巧进行了越南的汉语各体文学创作，这其中便包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的研究成果。

含了大量汉文小说。在越南汉文小说中,历史题材的章回小说表现最为突出,它们“是汉文古籍中最典型的小说。其特点是白话散文体、篇制巨大、以章回划分段落、主要描写大型历史事件。所以有学者称它为‘历史演义’”。

现存可见的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共有五部,即《皇越春秋》、《越南开国志传》、《安南一统志》、《皇越龙兴志》和《驩州记》,成书时间在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¹它们在叙事时间上几乎涵盖了从15世纪至18世纪越南封建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在叙事空间上则不仅纵横于越南南北各地,还对亚洲地区的中国、暹罗、真腊、日本、缅甸、老挝、小西(印度),欧洲的大西(法兰西)、红毛(英吉利)、笔须稽(葡萄牙)、希坡儒(西班牙)等多有记述,其中又尤以中越交往事件描述最多,刻画最充分。本文即以这五部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考察越南民族话语所传达的作为异国的中国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是近年国内学术界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借鉴西方形象学理论,利用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他者形象建构展开了深入研究。然而迄今为止,该领域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西方文学以及东亚汉文化圈内的日本文学和韩国文学,笔者尚未见到对越南文学里中国形象进行专门研究的相

关成果。这实在是一件憾事,越南不仅是历史上受中国影响最深刻的近邻,而且是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剖析越南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与阐释对深入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整体研究中国形象在东亚汉文化圈内部的生成、转变与影响过程,以及进一步拓展中国形象研究的空间无疑都是极有意义的。

一、重要的异国

现存可见的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主要描述陈朝末年至阮朝初年的历史事件,直接涉及的中国封建王朝也集中于明、清两朝。其中《皇越春秋》记述天圣元年庚辰至顺天元年戊申年间的越南史事,以陈朝覆灭、胡季犛僭国和黎利起兵建立后黎为主要情节,明世祖至明宣宗时期中越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是贯穿情节的主要线索之一。《越南开国志传》记述自黎英宗正治十一年至黎熙宗正和十年,在后黎朝政治混乱、南北纷争、战乱不断的背景下,阮福映家族顺势崛起的历程。该故事述及越南使臣出使明朝、明亡后遗民流亡越南的事迹,其篇首的《越南开国志传序》及《越南开国世系》中还提及清康熙帝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的史事。《安南一统志》记述后黎朝南北战乱的历史,从黎显宗时期郑王弄权招致西山阮氏以灭郑扶黎为名据国,至最终郑主败亡,西山王

阮光缵被擒,后黎朝覆灭。其中述及了黎帝于乾隆、嘉庆年间前往北京向清朝求援的史事。《皇越龙兴志》接续《安南一统志》的记述,自景兴三十八年阮文岳起事,写至阮福映平定西山之乱后建立阮朝。其间亦述及两广总督孙士毅兵败玉洄、清朝册封西山阮惠及批准阮朝改国号为越南的史事。《驩州记》记述阮景家族前后八代人在二百七十三年间铲除僭越的胡氏政权、辅佐后黎复兴的家族史,其中述及明万历帝册封黎氏与莫氏的史实。

作为以描述越南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各部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或多或少都提及了中国,有的以两国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事件为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有的仅以个别历史事件作为越南王朝更迭的标志。但无论如何,中国形象在越南古代历史演义中是无所不在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显然是基于中越封建王朝之间政治上紧密的关联度,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则构成了对中国异国形象的连续性的社会集体阐释,显示出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叙事话语里中国形象的总基调——深刻影响越南政治格局和王朝命运的重要的异国。

二、峻丽严庄、太平富庶的帝国

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书写越南重大历史事件,因而叙事的空间也多在越南。不过,也借助越南历史人物

1 任明华:《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的视角和口吻，直接刻画了中国的山川风物。《越南开国志传》写到越南使臣冯出使明朝期间，“闲游明国，观看山川寺塔等处，所见极其峻丽严庄”。“峻丽严庄”彰显的是雄伟和气派，概括了对中国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总体评价。《皇越春秋》写陈朝王室后裔陈天平亲自前往北京向明帝求援时，通过他的视角和口吻充满羡慕地直接描摹了明朝都城北京的人文风貌：

……遥望北京，山河城郭依然，市井闾阎未断，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诚为太平一景象。因起兴赋小律云：九天文物北京华，处处钟鸣鼎食家。客里清愁无可奈，衣冠仍是旧山河。

据《明史》记载，陈天平向明朝求援的历史事件发生于永乐二年，距离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帝位不久，而其下令大规模兴建北京城则是两年后的事情。虽然元大都已经为北京城市奠定了基本布局和规模，但它毕竟刚刚经历了元末的长期动荡和战火洗礼，因而《皇越春秋》中祥和富庶的北京城是带有一定文学虚构与文化想象意味的。

太平富庶的中国封建王朝都城映射的是强盛的中华帝国的形象，与越南陈朝后期“府库空虚，政烦赋重，民不聊生，盗贼相寻，权臣僭窃”的社会乱象形成鲜明对比。“客里清愁”在空间的变换中寄托着无奈，“旧山河”则抒发了历史的沧桑感慨，两者在时空上都蕴含着叙事主体面对太平富庶的北京城的疏离感。这种情感张力不仅抒发了废帝陈太平的人生感慨，也显示

出越南汉文历史演义所蕴含的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与塑造。换言之，恰恰是由于越南民族的贫穷动荡的自我形象定位，催生了越南汉文历史演义中峻丽严庄、太平富庶的中华帝国形象。

三、同文同种的类我

越南古代民族神话中有鸿庞氏的传说，讲炎帝的后代龙君与姬姬相爱，姬姬产下一胞，胞中百卵生成百男，其中一部分成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另一部分则是越南民族的始祖。可见，越南民族认为其与华夏民族同种，在血缘上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与此相应的是，越南汉文历史演义在赞美本民族的历史人物时，不仅在文本形式上采用中国文学常见的套语形式，

而且往往借用中国历史人物的典故加以简单类比。例如，《越南开国志传》称赞越南著名文士冯克宽“生得聪明慧智，识量过人，有诸葛、刘基之才，颜、曾、思、孟之学”；赞美贤王王孙出生时样貌不凡，“生的尧眉、舜目、禹背、汤肩，体状类唐宗，丰姿同宋祖”。再如《皇越龙兴志》以册文赞美王太妃：“汉文继统，正薄后之徽名；宋祖开基，尊杜妃之殊号。曰事皇考于潜龙之曰，舜妻宫阙自雍熙；保冲人于虎闼之秋，尧母门庭遗庆善”，并称赞阮福映“显亲孝大优虞舜，攘盗功高媲李唐”。这些话语虽然是直接赞美越南民族的历史人物，却完全融入了汉文化的语境中，从血脉延续和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都极大地淡化了中

国作为异国的形象，模糊了自我和他者的界限。

越南古代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润，越南的儒士阶层在儒家文化的孕育下以汉文进行书写，对中国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越南汉文小说多次描述了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情况，例如《皇越春秋》写郡县时期黄福在当地“设府州县学，及阴阳医学僧纲道纪等书”，“居交趾十八年，设绛帐教学，弟子信从者众”，教导了林少碍、黎公侯等一批越南弟子，并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及其被召还时“交人有何盛恩者，扶老携幼送之”。《皇越春秋》在讴歌黎利集团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明军浴血奋战的叙事话语中，却对黄福在当地开展文教活动表现出极大的认可。这种话语反差显示出越南汉文历史演义在塑造中国的异国形象时，将其政治形象与文化形象分立的特点。可以说，恩师形象不仅是黄福的个人形象，更代表了越南儒士阶层高度认同的中国文化形象。

越南汉文历史演义刻画那些与越南将领进行激烈军事对抗的中国官员时，一方面嘲讽其妄自尊大、穷兵黩武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也常常淡化其作为异国入侵者的政治身份，转而赞赏其文化人格。例如《皇越春秋》写明将朱贵寡不敌众造成失利，但宁死不屈、自刎而死，黎军首领惜其人忠义，不仅将其安葬，后还追封吴王为其立庙；写明将何忠被俘后宁死不降，称赞他“丈夫志气异乎人，义胆忠肝怯鬼神”；写明将李任、顾福、马智兵败殉国，

分别以诗吊云“人臣事主效忠贞，竭尽心思望北城。自古人生谁不死，死于国事死犹生”，“回头北向泪汎澜，城与俱亡不记还。一带昌江天地老，令人起敬马中官”。这些中国文臣武将作为军事上对立的异国官员，却能得到称道，完全是由于他们身上体现的中国文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越南汉文历史演义赞美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并将具有这种人格的中国官员与越南民族的忠臣义士进行相似类比，折射的是在文化同源认知下越南民族对自我文化形象的期待。可见，在高度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越南历史演义中的中国文化形象不是二元对立中的他者，而是具有相同文化身份的类我。

四、百万雄兵的熊桓之族

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叙述最多的中越交往事件是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政权的册封。《皇越春秋》中逆胡废陈帝篡位，诈称陈朝子嗣已绝，于是明朝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胡氏篡乱被平灭后，陈朝后裔陈曷一旦重返交趾，便上表明宣宗请求册封为王；陈曷暴毙后，曾与明军连年鏖战的黎利也同样遣使请求册封。《皇越龙兴志》中后黎昭统帝与西山阮惠集团激战，昭统帝向清朝求援，乾隆帝封其为安南国王；阮惠一方面击溃清朝孙士毅援军，另一方面通过福康安请求册封，清帝又封阮惠为安南国王；阮惠死后，其子阮光缵嗣立，亦遣使如清请封，清帝册封其为安南国王；阮福映平定

西山之乱后，即遣使如清请封，改国号为越南……册封情节几乎贯穿了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各个越南封建政治集团都在积极寻求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得到册封才意味着取得名正言顺的正统地位。越南历史演义叙述的这种政治生态既是越南古代正统政治的真实写照，也凸显了中国作为异国的天朝上国形象。

在请求册封或求援的叙事话语中，越南君臣不仅在称谓上尊称中国封建王朝为“天朝”“上国”“圣皇”，自称“下藩”“贡臣”“外臣”，而且行为举止均体现出外夷臣服的恭顺与谦卑。例如《皇越春秋》第二回以“陈天平乞怜上国”为回目，写到陈朝王室继承人陈天平在明朝满朝文武面前叩头求援：

奏曰：“臣陈家后裔，声教外臣，恭遇天朝，率先归顺，受封数世，抚有南邦……伏望陛下天地父母生成之德，恤及微臣，世守南邦，恭修职责。季犛父子罪逆滔天，臣与此贼誓不俱生。”因叩头流血。

《安南一统志》述及后黎朝两度被西山集团据国，昭统帝被迫向乾隆帝求援，并写信向两广督部哀告：

本国三百年来，仰藉天朝威德，世守藩封，国内绥靖。不幸运遭中否，……遥惟天覆地载，遐远不遗，追轸臣先世恭顺之诚，悯臣弱息羁栖之苦，敕下提兵压境，讨罪定乱，再造臣国。万倚天恩，大皇帝之德，不可名言。

昭统帝派出的使臣来到清朝太平府堂，拜伏陈情：

……以事奔告天朝。仰蒙轶及下藩，提兵为援，即可于国内举事，凭仗天威，驱策义士，克复乃有其机。……伏念小国臣事天朝，三百余年，职责不绝，一旦为他所占，社稷邱墟。人穷则反本，不得不呼天诉之。大皇帝下国之天，列宪大人佐天之吏，万望体恤遐荒，兴灭继绝，俾贡臣黎氏得以邀天之福。

显而易见，越南历史演义的叙事话语刻意强化了中越关系中的基本宗藩特征，以自怜自伤的口吻传递出作为番邦外夷面对宗主国时卑微无奈的自我感受。

越南历史演义中多次以夸张的手法渲染中国封建王朝强大军事力量，例如《皇越春秋》写到明军“雄兵十万、健将三十员、舟师三万、马骑八千，粮饷整齐，器械备具”，征讨黎善时“弥山遍野而来”。面对兵强马壮的明军，越南将领一再感叹“我兵微将寡，国小民贫，故提数千乌合之师，而抗百万熊桓之众，正犹以乌卵而斗泰山耳”。越南往往不得不利用地形、战术，甚至采取游击战以保存实力，“我之兵少将微，民贫地旷，此处不可久驻……退入义安、蓝江社，此有千仞山、九百九十峰，甚是险恶，分屯居驻，彼虽有百万雄兵，不能飞过，如此得可保万全”。熊桓之众、百万雄兵的中国军事形象，显然与历史上自秦汉时期开始的对越军事征服有关，是长期存在于越南民族心理中的强大军事压力投射出的文学映像。越南历史演义以之与兵微将寡、国小民贫的自我形

象对比,“他是大国,十倍于我”的反差构成了弱小民族对宗藩关系的无奈阐释。

五、令人失望的宗主国

即使作为藩邦属国,越南社会对理想中的宗藩关系也存在明确期待。《驩州记》中节制官长国公对明使说:“天朝中国,宜居中持平,劝善惩恶以镇服外国可也。”“天朝正统,宜大居正,着正言、行正事。”即希望宗主国中正持平,通过为弱小国家、民族主持正义达到令藩邦外国臣服、王化天下的作用。不过,越南历史演义中塑造的中国政治形象却与这种理想大相径庭。

第一,有觊觎之心的宗主国。《皇越春秋》记述明将张辅奉命扶助陈天平复国,但他“见交趾山河城郭、朝市人民,国富家稠、男清女秀,已有占据之意,自引将佐佯为巡抚郡县,以观形势”。剿灭逆胡后他“意决吞并,遣人画南国地图”,并且“密使谕百姓请立郡县”,还上疏诡称“民心如此”,最终造成明朝郡县安南的局面。《安南一统志》中清朝两广总督孙士毅一方面承诺助昭统帝平定西山之乱,另一方面却在心里盘算“安南在汉、唐为内属,至宋,丁氏倔强,始为贡臣,更代相沿,以至于今,复不能保有其国,天其或使为中国之郡县乎!”巡抚孙永清也称“方今黎、阮相攻,黎必为阮所并,莫若按兵不动,然后乘其弊而取之,未为晚也。”虽然张辅上疏洪武帝郡县安南是史实,孙士毅、孙永清也的确

曾出兵安南征讨西山集团,但《皇越春秋》与《安南一统志》中的相关叙事是以人物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展开的,无疑是在史实基础上进行了文学虚构。这种文学虚构不是集中出现于一部作品、针对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故而其意义也就不仅局限于塑造中国官员的个体形象,而是构成了对中国政治野心的集体想象。越南历史上虽然曾多次被军事征服,并纳入中国版图,但越南民族却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即使作为中国的附属国纳贡称臣,只要领土不内属,就意味着“堂堂与中国并帝”的国家独立地位。越南古代汉文历史演义对中国郡县安南野心的集体想象正是越南民族基于国家沦亡的历史经验,出于对民族独立的珍视而保持高度警惕的写照。《安南一统志》中西山北平王谕告越南百姓:“北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自汉以来,北国之人,寇我甸畿,鱼肉我生民,囊括我财货,人不堪命,咸思逐之。……今清人复来,谋取我南国,置为郡县”。这份谕告恰恰揭示了有觊觎之心的中国宗主国形象的生成过程。

第二,利己主义的宗主国。《皇越春秋》中写到陈天平陈朝后裔哀告求援时,明朝洪武诸臣的不同态度——有的主张“举兵执胡氏父子而归,郡县其地,以绝后患”;有的建议“莫若置之度外,使彼各自区处,成败不关于我,得失即委是他”;有的则提出“宜先遣人问罪,使迎天平,归其国政,彼若贪权固位,则举兵诛之,立陈氏后,

统治交人,永为臣妾”。这三种主张虽然手段不同,但无论“郡县其民”还是“置之度外”或者“永为臣妾”,其基本立足点是一样的,即并不是支持藩属国安定繁荣或民心所向的义举,而是仅仅从宗主国的自身利益出发。作为越南正统政治的象征,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叙事话语本应是隆重庄严的,但越南历史演义中册封情节几乎是频繁、草率的复现式事件。《皇越春秋》中胡季犛父子废陈帝篡位,明洪武帝虽然曾移书责之,但胡氏诈称陈朝子嗣已绝,于是明朝遣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皇越龙兴志》中后黎朝昭统帝与西山阮惠集团激烈交战,向乾隆帝求援,清朝不仅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等人出兵相助,还封昭统帝为安南国王。然而孙士毅轻敌溃败后,两广新督福康安一方面畏惧西山集团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接受了阮惠的贿赂,于是指使阮惠遣使入朝递贡,清帝遂改封西山阮惠为安南国王。后阮福映起兵平定西山之乱,实现江山一统,清帝再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可见,在越南汉文历史演义的叙事话语中,中国王朝的册封要么是出于失查而上当受骗,要么是垂涎于请封者缴纳的丰厚贡品,要么见风使舵地支持占据军事优势的政治集团。这些话语中的反讽意味凸显了一个利己主义的、不负责任的宗主国形象,揭示了越南社会对宗藩关系现实意义的集体反思。《安南一统志》中西山阮惠看到乾隆帝给孙士毅的诏书后,称“我看清帝诏书,不过亦视强

弱为左右耳，存黎义举非是本心，特假此为名而实图自利”，则是直言不讳地对这种宗主国政治形象做出了明确的阐释。

第三，傲慢无礼的宗主国。《皇越春秋》中明成祖得知胡汉苍击溃明军的消息，怒斥“蕞尔小国，敢拒大邦！”与明成祖的蔑视态度相应的是明朝各级官员的傲慢无礼，即使是有超凡的军事才能与过人智慧的越南民族英雄黎善，也被明将蔑称为“一辈群小”、“南蛮草寇，亦不过狐假虎威，某视之如腐鼠耳，不足挂齿。”《安南一统志》中两广总督孙士毅不仅自大轻敌，狂妄地宣称“尔国久被残虐，神气沮丧，故动以虎狼相狎。自我视之，若犬羊然，一使人以绳系其颈而牵之，定无难也”；即使面对被乾隆册封为安南国王的昭统帝，“亦崖岸自尊，帝来谒，或不与相见，但于铃阁下传称

无军国事，且还宫休谒，其酬接礼意，最为简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华夷之辨，出于民族的自我优越感而贵“华”贱“夷”，所谓“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即主张华夏民族对蛮夷保持领属关系。华夏民族在文化传统上视越南民族为南蛮，《明史》在记述越南民众对明朝郡县安南的态度时，便蔑称“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除华夏民族外的周边民族包括越南，都被塑造为“蛮夷”的异族形象。越南虽然无力摆脱“甸服”、“侯服”的局面，但其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历史上便有越南使臣拒入“粤南夷使公馆”的事件。¹越南历史演义中塑造的中国傲慢宗主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中国文化中越南“蛮夷”形象的文化反馈。

六、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在域外汉文化圈的延伸，越南古代历史演义以汉文的书写方式和历史演义的惯常体制展开叙述，以越南民族的话语讲说和阐释了中越历史上的众多事件，借助历史真实、文学虚构与文化想象共同集成了多元化的中国形象，既显示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反馈，又折射了越南民族文化主体意识下的自我形象认知。对此，我们无需进行正确与否的价值评判，而是应在历史文化的大视野内，解读域外汉文化圈塑造的作为异国的中国形象，考察催生这一形象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等诸多动因，这不仅对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研究而言是有价值的，而且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华文化的当代传播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 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越】邓台梅、黄轶球译：《越南文学发展概述》，载《东南亚研究》1964年4月。
3. 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
4. 【越】阮榜中：《越南开国志传》，载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 【越】佚名：《皇越春秋》，载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6. 【越】吴甲豆：《皇越龙兴志》，载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7. 【越】吴时恂、吴时悠：《安南一统志》，载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8. 【越】阮景氏：《驩州记》，载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9. 尚学锋、夏德靠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10.（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 任明华：《越南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